

## 第四编

# 强国之梦

### 第 16 章

## 天佑良机

### 战 后 经 营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节节取胜，然而，普通国民并不清楚战争能力是由军事力量和财力决定的。在战争期间，几乎所有的国民以忍受高价商品、增税甚至兄弟父辈血洒疆场为代价，支持了战争。他们不知道在决定陆战胜负的奉天会战中，日本军队的弹药几乎耗尽，俄国军队若再能坚持一下，其战局将难以估计。以《马关条约》的经验来看，他们认为战败的俄国应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偿金，便以一种急切盼望的心情等待从朴茨茅斯传出如愿以偿的好消息。著名的主战 7 博士之一水户宽人，甚至提出了赔

偿 30 亿元，全部领有桦太（库页岛）、堪察加、沿海州，接管东清铁道和接管新加坡以南全部俄国军舰的方案。期望值之高，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当日俄双方议定的条约内容泄出时，国民宛如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之中，热情瞬间灰飞烟灭。

“让我们的兄弟和儿子抛尸满洲旷野，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支付了重税、作出了这样的牺牲，到底为了谁？”

民众对藩阀政府的不满情绪急速地扩展开来。当年气候不顺，农村劳力又因忙于战争而严重不足，造成稻米歉收，米价上涨，更助长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商人抱怨店铺门可罗雀，几乎难有顾客上门购物。工人们本来期望聚在一起喝酒庆贺胜利，但眼见不能分羹一杯，只得叹息苦不堪言。

这种情绪，因传出元老大臣仍旧喝醉了酒同艺妓戏耍的消息而变得激烈起来。8月22日夜，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在东京一个叫“瓢屋”的酒屋同艺妓嬉饮俏闹，而遭到《万朝报》痛斥：“此等人胸中无国无民，旁若无人。如果国家大事有必要利用酒色，为何又不将鲜鱼和美女送给战场的军人？”《大阪朝日新闻》等报亦群起而抨击之。《报知新闻》更是认为“全国人民和军队都被桂太郎首相和小村寿太郎全权代表出卖了”。

于是，反对媾和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场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敢于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向藩阀政府表达自己心声的勇气，但由于全然不反省由于战争是将他国（中国）疆土作战场来打的，因而对不是战争双方的第三国（中国）而言又是一种彻底的侵略行为，反而却为赔偿得不够而愤懑不已，因此渗透着一种极为自私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大阪的纺织界资产者首先发难。因为他们认为“屈辱”媾和的结果，会造成输往中国和朝鲜棉制品数量减退。8月30日晚以

这些人主持的媾和问题晚餐会为一导火索，在新兴资产阶级领导下，大阪中之岛公会堂召开了有 5000 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同日在栃木、名古屋、吴，翌日在山形、神奈川、三重、堺、高松等地，都召开了市民（或县民）大会。各地大会最后都发出了废除和约的呼声。由一村而一乡，由一町而一市，废除和约的吼叫响彻全日本上空。

东京。日比谷公园的中心广场，这里矗立着巨大的喷水池，沿喷水池四周的草地，有一群群鸽子在觅食。看上去如此安恬舒适的环境，1905 年 9 月 5 日却是日比谷暴动的发源地。最先来到此地的，是黑龙会系右翼头目头山满和自由民权的战士、宪政本党领袖之一的河野广中。

“来呀，来呀，来吧！媾和问题全国同志大会，特在本日召集大会。有血有泪的来吧！有骨气有志向的来吧！知义晓耻的请都来吧！圣明的天皇一定谅解赤子之至情吧！”当日，当朴茨茅斯市所有教堂鸣起钟声庆贺谈判成功如期签字之时，聚集在日比谷公园内的数万群众喊起号子，冲破了警察的警戒。他们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集中在袭击首相官邸、内相官邸和政府系报社、警察派出所的一拳一脚、一砖一石上。东京市 80% 的派出所被焚烧或捣毁，有 2000 多人因此而被捕。

积十年而一发。甲午战争之后，迫于俄、法、德三国的压力，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了中国。当时明治天皇立誓卧薪尝胆，10 年后，果然由“黄种人的立宪国”打败了“白种人的野蛮国”。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动员了几乎所有的人民群众。在他们做出各种牺牲的同时，也催发了他们认识自身力量和价值的能力，政治上的觉醒也一并培养起来。“日俄战争的苦痛使国民觉悟到有实行普选的必要”，然而，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在日本人能够打

败任何妨碍日本国家利益的敌人的认识中，逐渐滋生出来。这种民族优越感与功利观结合起来，在国家发展和海外扩张两个方面，一正一反地发挥着长期的作用。

然而，桂太郎内阁之所以不向俄国索取战费赔偿金而接受《朴茨茅斯条约》则是因为不仅看到了日本作战能力的界限和俄方作战力量的潜力，洞察了世界及远东各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而且也正确地估价了由于战胜俄国从而获得的向朝鲜、满洲扩张势力的主动态势。根据条约，日本取代俄国成了朝鲜的保护国，接管了长春至大连间南满铁路所属权利，并获得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些从沙俄那里夺得的侵略权益，就成了日本进一步扩张侵略的立足点。1890年山县有朋在国会施政演说中提出的“利益线”到了1905年时终于赢得付诸实现的基本前提。

1906年，当时在参谋本部任参谋的田中义一中佐，向陆军元帅山县有朋提交了一份长篇意见书，题目为《随感杂录》。该意见书以其在日俄战争中所感知的经验与教训，论述了日俄战后应采用的国防政策。山县熟读之后，赞许不已，下令田中义一草拟国防方针案。田中将拟出的草案呈山县审阅，又经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传阅，两位军界巨头表示一致赞成。这后来被俗称为《田中私案》的国防方针草案。在充分参考《田中私案》的基础上，10月，山县提出了自己的帝国国防方针案，俗称《山县私案》。《山县私案》于同年12月经元帅府审议后，翌年2月经西园寺首相审阅上奏天皇，4月4日天皇裁可。这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国防方针》。

国防方针由三个文件组成，即《日本帝国之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和《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其基本内容是：依次确

定俄国、美国、德国、法国为假想敌国；在俄国或美国对亚洲采取攻击的可能情况下，陆军需要 25 个常设师团，海军需要战舰 2 万吨共 8 艘、装甲巡洋舰 1.8 万吨共 8 艘（通称八·八舰队）；只有如此，才能在有事之秋，海军可歼灭海上来敌，而陆军则可制敌于先，集中兵力占取战略要地，展开机动态势<sup>①</sup>。

根据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经验，弱肉固然可以强食，但在旁边窥测时机以图争食的狼豹实不在少数。所以，从《方针》的基本内容看，作战的主要敌人是欧美诸强，但要吞食的对象却唯在满、朝而已。《方针》的第一项再次强调：“根据开国进取之国是，图谋国权之扩张，致力于增进国利民福。”为此，“虽可面向世界八方经营，然在明治三十七、八年之战役（日俄战争）中，抛几万生灵与巨万财货，当然为了扶植在满洲及韩国之利益，再向亚细亚之南方及太平洋之彼岸伸张，以拥护民力之发展”<sup>②</sup>。

在该国防方方针制定审议的过程中，陆军和海军的意见并不一致，海军认为俄军的海上力量已经在日本海海战中被歼灭，应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而陆军则对俄国的陆上战斗力以高度评价，坚持以俄国为第一假想敌国。这种分歧虽然还谈不上就是后来南进论与北进论之争的雏形，在主要体现了陆军意见的国防方针上也将向南方甚至太平洋彼岸作为政策目标，但要真正实现之，事实上有很大困难。天皇本人亦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便向西园寺首相咨询可能性，西园寺答道：“赞成国防方针，也要强调外交努力。”因为所需兵力从“财政上也不允许立即全部完成”，只好

<sup>①</sup> [日]伊藤隆监修、百濑孝：《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制度与实态》吉川弘文馆 1990年版，第 276 页。

<sup>②</sup> [日]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5 年版，第 12 页。

“结合国力 斟酌缓急”。<sup>①</sup>

西园寺的回答是合乎当时日本国力的。事实上，日本能够有所“作为”的，是趁俄国战败无奈退出满、韩角逐而其他列强尚无借口乘隙介入之机，按条约内容迅速地在朝鲜和中国扩张势力，占领俄国留下的空白。日本政府也正是这样做的。

没有像甲午战争后那样的巨额赔款，缺少资金注入，日本经济一时疲软。但仅过一年，社会投资猛地一下热烈起来。新的刺激正是从战利品满洲那里传来的。1906年初，西园寺首相秘密视察了满洲 回国后立即召集了“满洲问题协议会”。会议议定即时撤消军政 将刚成立 3 个月的关东总督府改为一般性的行政机构。9 月 1 日设立关东都督府以取代关东总督府，负责关东租借地行政，管理南满铁路业务。这意味着对南满地区的正式经营已经步入轨道。在此同时，一个半官办半民办的大型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即所谓“满铁”宣告成立。满铁号称有 2 亿资本金，其中 1 亿由政府以实物出资，取得了一半股票，还有 1 亿在民间募集。

9 月 满铁成立 发股募集资金的消息在日本传开后，一个巨大的争购满铁股票的投资热潮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掀起。虽然每股达 200 日元，但由于实缴资金仅是股票票面额的 1/10 并向股民承诺 15 年内每年红利高达 6 厘 所以股民极欲购得 实际认购股数竟达到计划募集数的 1077 倍。这样的股票风潮 极大地刺激了投资者的信心，民间的设备投资在很大程度得益于满铁成立而造成的连续刺激。

<sup>①</sup> [日] 防卫厅战史室：《战史丛书》之一《大本营陆军部》，1965 年版，第 132—151 页。

如果说本世纪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这时候的大连则应谓之掠夺者的天堂。仅以运费而言，铁岭以北运往营口和大连的货物，因满铁本社在大连，所以尽管大连运距遥远，但两地运价却相等。大连因此而迅速繁荣，而因辽河水系发达起来的富饶商港营口却一下子凋零了。

要把朝鲜变成殖民地的计划，即使在日俄刚刚开战尚未有结果时，便开始实施了。1904年2月23日，日驻韩公使林权助收买了韩外务大臣李址谿，并施以武力恫吓，逼迫朝鲜同日本签订了《日韩议定书》。根据此议定书，韩国承认日本是保护国，向日本军队提供军事行动上的便利及基地，并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违反本议定书趣旨的协约。

击败俄国后，许多日本人欢欣鼓舞，但山县有朋警告说，俄国有可能卷土重来。而伊藤博文则认为朝鲜本来也许通过谈判就可以得到，现在用武力取得，就不要将其完全合并，使其成为日本所需要的缓冲地带，接受日本保护便足矣。由此，他力排众议，亲自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开始了一系列使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的工作。

伊藤的策略是：充分利用战胜俄国而产生的威慑效应，并辅之于荷枪实弹的宪兵威吓，收买并利用贪生怕死的韩国内奸，尤其是以李完用为首的“乙巳五贼”，使其成为内应或代言人；扶植亲日势力如“一进会”，排斥乃至镇压反日派；全面控制韩国的内政外交大权。

从1905年11月到1910年8月吞并朝鲜为止，日韩之间一共签订了三次“协议”。1905年11月17日签订的《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日韩保护条约》，规定韩国外交被置于日本外务省的

“ 监理指挥 ” 之下 没有日本为中介 韩国不得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条约和协定，在韩国皇帝之下设日本统监，在地方设日本理事官。伊藤博文本人由此而成了第一任统监。由于发生了“ 海牙密使事件 ”<sup>①</sup> 伊藤认为“ 改变局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 ” 来了。1907 年 7 月 19 日，伊藤逼李熙让位，扶皇太子李拓登基，随之便与韩国签署了《第三次日韩协约》 又称《日韩新约》。条约规定韩国内政须由统监指导，制定法制、任免高级官员均须得到统监认可。该条约的绝密备忘录还规定解散韩国军队（仅可保留一个大队守护皇宫），任命日本人为各部次官、内务警务局长等。这样，日本便全面控制了韩国从地方到中央的一切实权。1909 年 7 月，第二次组阁的桂太郎首相、小村寿太郎外相同伊藤商议最后吞并朝鲜。伊藤表示“ 既然政府方针已经决定 ”，<sup>②</sup> 便不想反对。同年 10 月，伊藤辞却统监回国第四次担当枢密院院长，后为调整日俄关系亲赴哈尔滨同俄财政大臣科科弗采夫会晤，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枪击致死。伊藤博文的被刺，就成了日本吞并朝鲜最方便的藉口。1910 年 8 月 22 日 由寺内正毅统监同李完用首相之间秘密签署了《第四次日韩协约》 即《吞并韩国条约》 所有政治团体（包括一进会）全部解散；废除韩国警察；日驻韩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兼任统监府警务总长。社会治安由 2000 名日本宪兵和 4000 名韩国宪兵后备队担任。韩国国王和王室成员，按日本皇室典范惯例，拨 150 万元经费供一年开支，其中有侯爵 6 人、伯爵

当 1907 年 6 月第 2 届世界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时，持有皇帝李熙全权委任状的韩国特使突然出现在会场，要求各国否认日本对朝鲜的“ 保护权 ”。

[日] 犬丸义一、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史》 第 2 卷 新日出版社，第 172 页。

3 人、子爵 22 人、男爵 45 人，共 76 人享受日本华族的尊号及待遇。旧官吏 3345 人得到日本政府恩赐金共 679 万元，官吏集团中的孝子、节妇和遗孀也得到了赏赐。惟普通人民，丧失了自己的祖国，开始了长达数十年屈辱而痛苦的殖民地奴隶生涯。

当 1905 年 11 月签署《第二次日韩协约》之际，在韩国王宫召集大臣会议。伊藤博文端坐中央，两侧是战战兢兢的韩国朝臣。突然，伊藤拿出日韩协议书问道：“想听听列位对此案是赞成还是反对啊？明白地说！”这时，从王宫外传来了日本宪兵枪刺碰撞的声音和吼叫声。然而，仍然有人起而拼死反对，韩总理韩圭高猛然离席，大呼“绝死反对”后，便向皇帝李熙的房间奔去，以求蔽护。不想过于惊恐，一下子跑到王妃的房间去了。这时，林权助大使在一旁冷笑道：“最好用冷水从头浇下去让他清醒清醒！”

著名日本作家石川啄木听说吞并已成事实，无奈地写道：“地图之上，着墨重写朝鲜国，耳边却闻秋风骤。”

由于保护条约的签署，由统监一变而为第一代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在日记中写道：“小早川、加藤、小西<sup>①</sup>若在世，可见得今宵之月明乎？”

然而，在满洲（中国东北）的经营却不比朝鲜，尚未达到只凭武装蛮力便可成就好梦的程度。1905 年 12 月 22 日小村寿太郎在北京同清政府签署的《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即《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得以继承原俄国在南满的全部权利，但由于清政府的抵抗，留下许多悬案。关东都督府和南满铁道虽已

<sup>①</sup> 小早川隆景、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皆为丰臣秀吉 1592 年发动侵朝战争时的武将。

攫夺手中，但南满洲地区的基本主权却仍然握在清朝手中。1907年6月，清朝新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并耐人寻味地任命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唐绍仪为奉天抚巡，明显地具有对抗日本的意味。东北地区的人民和社团亦不甘轻易就范。因此，对日本在南满的经营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综合抵抗姿态。1907年初，山县有朋在一份意见书中谈到：“对我在满洲之经营，所到之处皆试图反对或妨碍，须经彼我两国协议之事业几近停滞，其弊将不堪忍受，乃今日之实况也。”<sup>①</sup>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俄国虽败退北撤却仍占据北部满洲，仍有力量南下，且其背后有欲拉其入伙一起对付德国的法、英两国存在。而美国在调停日俄签约后，一直想在“满洲”问题上验证日本对其“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是否怀有诚意。显而易见，在经营满洲权益方面，比与清朝达成协议更为重要的是，同诸列强摆平关系。否则，日本的满洲权益便会失去各列强的“默契”，必将带来棘手的问题。

日本的对策是，仍然以《日英同盟》为依托，首先调整同法、俄的关系。1907年6月、7月和8月，日法、日俄和英俄之间相继缔结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同《俄法同盟》、《日英同盟》和《英法协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德国际联合。于是，“满洲”问题成了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的筹码。这里需要提出的是《日俄协约》的内容：主张中国独立、领土完整、机会均等；日俄相互尊重两国的领土和权利。以哈尔滨和长春间通过的第二松花江为界，规定两国权利范围；俄国不妨碍日本对韩国“保护”关系的发展；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权益。《日俄协约》的签署，

〔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305页。

为日本经营南满扫清了一大障碍。

然而，要调整同美国的关系却绝非如此容易。众所周知，日俄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不同于甲午战争后争夺势力范围，重点在于争夺铁路投资。从 1906 年起，美国国务院远东部就注意到日本排他性经营满洲的倾向，对日本违反“门户开放”原则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批判。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觉得日本经营满洲以后，可能会减轻对美移民压力，判断不干涉日本经营满洲是美国利益所在，抑制了国务院的意图。事实上，外相小村寿太郎就主张集中向满韩移民，认为这样既可以改善日美关系，又可以强化满韩权益，因此，当 1907 年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的好友，美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引进美国资本、建设从新民到法库铁路的计划，因日本抗议和美国金融危机而搁浅后，没有再提上议事日程。

同时，日美双方颇有克制地解决了移民问题引起的外交争端，并于 1908 年 7 月签订《高平—卢特协定》，相互承认太平洋现状，支持中国独立完整和机会均等。1909 年 3 月，塔夫脱（1905 年 7 月在西奥多·罗斯福政府任陆军部长时，曾同桂太郎首相会谈，签订桂—塔夫脱秘密协定。日本承认美对菲律宾的权力，美承认日本拥有不经日本同意其他国不得与韩国缔约的宗主权）取代罗斯福出任美国总统后，接受了国务院远东部的意见，认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应具备实质性的意义。在同国务卿诺克斯商议后，塔夫脱提出，为了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使用除军事手段外的所有一切手段。具体地说，就是以资本为武器，开展美元外交。这一政策的核心，即由美英投资建设锦州—瑷珲的铁路，并向中国提供贷款，使之将“满洲”铁路赎回，由国际共管，即所谓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毫无疑问，这一揽子计划改变了罗斯福时代美国对日外交政策，采取了进攻态势。

日本政府的对策是：以铺设连通锦州各铁路和满铁的铁道为代价，有条件地赞成铺设锦齐线；坚决反对满洲铁道中立化计划。由于俄国坚决反对中立化计划，英国以该项计划有引发国际争端之虞为由表示不赞成，法国认为计划必须以日俄两国的赞成为首要条件。所以，虽有德国支持，美国的这项计划最后付诸东流。

由于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同时损害了日俄两国在满洲的利益，反而促进了日俄之间第二次密约签订。双方约定南北“满洲”为日俄各自特殊利益地区，为维护特殊利益，两国要共同采取行动。

就在日本与各列强就满洲问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折冲的同时，日本与清政府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它们是：1909年8月签署的《关于安奉铁道备忘录》，9月的《关于间岛之日清协约》和《关于满洲五案件之日清协约》。这些条约使《朴茨茅斯条约》和《北京条约》具体化、实质化，也意味着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基本上得到了国际承认。

然而，又有谁曾预料到，日本的满洲权益在“法律”意义上的确定，实质上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完成的——即1904—1905年交战的日俄双方在整整5年的外交回合中成了互相提携的盟友，而促成交战双方和平停战的美国，却被严拒于“满洲”大门之外。日英同盟支持了日本，而中国的主权则完全成了列强角逐的猎物。不过，当日本满载“猎物”欢呼而归时，不要忘记自己并没有付出代价。日美之间加深的对立静卧在今后国际政治和日美关系的底部，并且不断地积累起来；英国因此而加强了对日本的警觉，英属自治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相继发生了排日移民活动。而且，在1911年7月签订的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中，加进了这样一个说明：即缔约国一方同第三国缔结条约时，对该国不适用此同盟条

约。根据英国要求加进的这一说明，表明英美正在接近。日英同盟变得单纯为了对付德国的需要而继续存在，它对日本的支持程度明显减弱了。日本的确成了东洋强国，它的发言甚至影响到了国际政局。明治以来的强国理想正在成为现实。然而，由于日本的强国化，尤其是在满洲的权益扩大化倾向，使列强提高了对日本的戒备心，本世纪初盛行一时的“黄祸论”的矛头首先是针对日本的。

## “多样化时代”

从日俄战争结束到明治末年数年间，日本在对外掠夺殖民地和利权方面收获颇丰，但在国内的经济政治方面，却是头绪众多，其历史特点难以简单地一言以蔽之。

在民间民主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民众在政治上觉醒的时代。大正时代著名的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在 1914 年 4 月号《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中说：

若思考这种现象到底始于何时，由于国民对《朴茨茅斯条约》极为不满，明治 38（1905）年 9 月在日比谷召开大集会可视为初具端倪。民众在政治上作为一大势力而行动这一倾向开始流行，则应视作在 38 年 9 月以后。

吉野作造以其民本主义者的特殊立场，认为大正民主主义的思潮始于日比谷骚动。这正好反映了他认为日俄战争之后的历史是大众开始参与政治的时代的观点。

与之相对，另一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德富苏峰在他自己的名著《大正政局史论》中谈到：

从明治 36（1903）年到明治 45（1912）年，约十年间，若桂成立内阁，西园寺则率政友会在众议院支持之；若西园寺成立内阁，桂则率可谓之他的与党的贵族院多数派帮助之。桂与西园寺之间何时起达成默契尚不分明。然举天下反对朴茨茅斯条约之际，西园寺却公开发表意见以示赞成，两人之间已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则不必再疑。

德富苏峰是桂太郎的侧近，在他后期许多著作论文的字里行间，每每若隐若现地透露出政府的看法。他的这段话，反映了他接近“主流”政治的立场，称这个时代为“桂（太郎）园（西园寺）时代”。

显而易见，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却都力图以自己的政治观点，给这个时代贴上标签。但值得指出的是，政治的变化是否能代表社会的所有变化？

从明治维新以来，有许多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被卷入由政府倡导的“富国强兵”潮流中。随着天皇形象的确立，《教育敕语》的颁布，天皇制国家机器的建立，许许多多的国民都为富强独立的理想而奉献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即使作为藩阀政府对立面自由民权运动的参加者们，亦莫不如此。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人们将自己的冀求和希望都寄于国家富强的实现和独立的完成上。然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上述理想基本达成，普通的民众开始认真考虑自我生活状态时，不由得产生出一种自我失落感。日比谷暴动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

日比谷暴动以后，新的社会思潮首先在都市出现。在城市居住的知识分子或大学生们，不是重视国家而是注重个人，不是期望国富而是追逐己富，不是以家族为中心而是唯自由恋爱主义。这些变化，其核心是个人主义，构成了日俄战后时代变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与以集团主义、国家主义为特征的明治初、中期相区别，一个多样化时代正在由思想领域内的变化为始点而揭开了帷幕。

首先要举出的例子是 1903 年高中生藤村操跳入著名风景地日光的华严瀑布自杀身亡。事件的本身，也许并没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但人们对自杀动机的讨论却颇耐人寻味。一般人认为，动机是“烦闷”并将导致年轻一代“烦闷”的原因归咎于时代的局限性。在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讨论中，人们行动的目的早已超出了事件本来的意义，欲与一切唯国家至上的观念决裂的、以个人好恶和欲望为事物判断标准的观念，在日俄战争后都市人口对政府普遍不满的情绪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站在这场思想运动最前列的，是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思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少年战士这时已长大成人，北村透谷创办的杂志《文学界》为浪漫作家们提供了讲坛。最先引人注目的是岛崎藤村在日俄战争中写就、于 1906 年发表的小说《破戒》讲述了一个出身未解放部落的青年教师如何破弃父亲的教戒，向人们坦白自己的“下贱”的出身，为追求新生活渡美求学的故事。国木田独步则以看透尘世的近似佛学的精神，讲述了自己愿意在野山丛林自由生存的心情。高山樗牛则以独特的“本能论”来讨论何为“美的生活”提出“道德与知识不过是为满足吾人之本能的必须条件”与谢野晶子则主张“官能之解放”。

紧接着浪漫主义之后而来的是自然主义的出现。它的登场，背景复杂。认为国家的富强必将实现自己的一部分理想的期待，在日俄战争以后的现实中被无情地击碎了。既然战胜了世界中的一大帝国，也没有看得见光明的未来，那还有什么可以冀盼的呢？为了偿还战争时期欠下的庞大的外债，政府加强了税收，普通民众依然继续过着贫困的生活。为了让广大国民顺从这种状态，政府加强了对国民思想和言论的控制。因此，明治末年不仅对社会主义者，对广大试图改变一下自己生活状况的市民和农民来说，都是一个漫长的严冬。

在政治上欲诉不能的情形下，自然主义就成了批判封建道德的宣泄。岛崎藤村的《破戒》就表现出了典型的自然主义的倾向，而田山花袋的《浦团》，则更以前所未有的勇气，鼓吹“露骨的描写”，向着传统的“醇风美俗”而在田山看来是天皇制道德的伪善性发出了一支投枪。自然主义在当时成为集中批判的对象，被斥之为“败坏风俗”。但今天人们回味历史时，却清晰地看到了在自然主义者对恋情和肉体刻画的笔触之下，充满着向既存道德决裂的果敢勇气，和对个性解放的渴求。

虽然同样主张个人主义立场，但其表现的形式却有别于或对立自然主义的思想代表，是永井荷风和夏目漱石。永井批判当时的日本人每每惧怕世间的批评，动辄便低下头来反省自己，从来也不敢向他人坦率地表白自己。他向往“西洋人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的精神，而且特别赞许西方人只想把自己活动的范围从国家可能控制的领域中脱离出来，独立自由地生存，并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作为自己的准则。夏目漱石在小说、手记和日记中，表明了应该十分重视个人主义在社会文明开化中的地位的观点。他在著名的《现代日本的开化》和《我的个人主义》两篇讲

演中，批判了西洋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开化是外发的这种明治以来已成定论的观点，并且以切身的体验证实正是个人主义才是日本开化的基础。漱石和荷风告诫人们，随着日本的“大国化”，一种日本已经成为一流强国的幻觉正在麻醉人心。这种思想认识必须予以彻底粉碎，理想的社会不应当是大国，而是个人的自立和自由。

在这股倡导以个人主义抵抗国家主义的思潮中，基督教信徒内村鉴三的观点也值得注意。身为中学教员的内村曾在《教育敕语》的宣读仪式上，因担心违背“基督的良心”而拒绝向天皇的署名施礼，因而被攻击为“不敬”遭致非难。在甲午战争时，内村先曾持“义战”主张，认为“促支那人警醒”乃日本人的“天职”。但因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一变“义战”论而为“海贼之战争”论，并为之深感愧疚。他反对日俄开战，“与其向外扩张，不如国内开发”主张日本宜像瑞士、丹麦那样，当一个“理想的小国”。他发表在《万朝报》上的一篇题为《国家、家庭与个人》的短文，常常为研究他的人们所重视。其中所表达出的果敢与同国家主义和家族主义针锋相对的勇气以及精辟的论述，是日俄战后个人主义思潮中别具风格的又一种类型。他写道：有善的政治却未必有善的社会，然有善的社会却有善的政治；有善的社会未必有善的家庭，然有善的家庭必有善的社会；有善的家庭未必有善的个人，然有善的个人则必有善的家庭。内村将完善的个人作为善的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向着明治政府专制统治下的思想、言论控制政策，发出了极为深刻的批判，在社会上博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

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潮，对青年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众多的青年之中，对国家的“忠诚心”减退了，对战争表现得冷淡甚